

丛书

黄侯兴
主编

创造社

学苑出版社

理论研究卷

创造社丛书

理论 研究 卷

黄 侯 兴 主编
蔡 震 编

学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创造社丛书·理论研究卷

主 编:黄侯兴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3号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5 字数:280千字

印 数:0001—2000册

版 次: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

ISBN 7-80060-542-8/G·322

定 价:10.00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纪念

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
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

郭沫若故居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创造精神赞^①

——代序

林 林

创造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学界以至整个文化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促进了思想大解放。在外来文艺思潮和艺术方法的影响下，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四十多个，出版文艺刊物五十多种。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最早，贡献最大，也最具代表性。

创造社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最初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寿昌、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王独清、陶晶孙、何畏等人，都是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先后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后期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十多种刊物。创造社的出现，被人们称作是一支“突起的异军”。它所显示的独异的文化观念，在文学领域倡导主观的抒情的浪漫主义运动，以及在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热情呼叫中所表现的崭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震撼了广大青年的心，给文

① 本篇系作者在1991年5月27日至29日于北京召开的“创造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致的开幕词。

坛带来了新鲜的风气。

创造社成立初期，曾经声明他们“没有划一的主义”，只有本着自己“内心的要求”从事文学活动。他们提倡表现自我，强调作家感情的自然流露，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因此人们习惯地称创造社是“唯美派”、是“为艺术而艺术”。其实，创造社注重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就是要表现他们爱国的情感和理想的憧憬。郭沫若把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比作“屠场”、“囚牢”、“坟墓”、“地狱”，他要用《女神》去拨动青年的心弦，点燃青年的智光，成仿吾要求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这些都反映了创造社核心成员的强烈的社会使命意识，说明他们并没有脱离生活的轨道，没有躲进象牙塔去“为艺术而艺术”；所不同的是他们侧重自我表现，以主观的心态去表现内心的矛盾、痛苦和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彻底叛逆的精神；他们擎起“创造”的旗帜，热情地呼唤着创造一个虽嫌朦胧却充满光明的新的世界的到来。在“五四”民主、科学的口号的鼓舞下，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创造社早期的文学创作，如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话剧，成仿吾的文学批评等，都充分体现了“五四”反抗、创造的时代精神，传达了觉醒的青年一代的呼声，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

随着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以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为界，创造社从张扬自我转向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这时，郭沫若等人已陆续回国，接触了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人民大众在“水平线下”的悲惨生活。他们提出要战胜资本主义“毒龙”，并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浪潮。到一九二八年，中国革命处在低潮时期，创造社才真正发生了剧变。这时，一批“新锐的斗士”从日本归来，他们以战斗的唯物论对于当时的文化现象展开了普遍的批判，高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郭沫若说，“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

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就退出了战线。”创造社原本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文学团体，分化的结果，一些成员离开了创造社，而郭沫若、成仿吾、彭康、李一氓、阳翰笙、潘汉年、李初梨、冯乃超、郑伯奇、朱镜我、李铁声等一批中坚分子，经受住了大革命失败的严峻考验，继续沿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前进。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创造社出版部遭国民党政府查封，创造社的活动才宣告结束。

应该指出，创造社后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在革命遭到挫折、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它表现了创造社后期成员的革命胆略和远见。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后期创造社所奋斗的事业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认为革命文学的旺盛，“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并称赞“在新分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同时，鲁迅也批评了他们存在的“左倾”错误。我们今天通过历史的反思不难看出，创造社所犯的“左倾”错误，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出现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白色恐怖的乌云笼罩下，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及无产阶级单独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新时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要求的，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斗争在文学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反映，而是要求占领整个文艺阵地，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但是，创造社后期成员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缺乏全面、周密的考察和分析，在日本福本主义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机械地搬用苏联的教条”，认为实现从“混合型的革命文学”向“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表现了“左倾”冒进的文学倾向。他们进而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斗争对象之一，提出“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对鲁迅、叶圣陶、茅盾、郁达夫进行了粗暴的批判，表现出宗派主义的情绪。历史的回顾，当然不是去追究某个成员的责任，而是为了引出可资后

人借鉴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郭沫若说，“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作为中国新文化滥觞期出现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存在的十年间，它虽然有过失误和偏颇，但它的功绩在文艺运动史上已经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精神——创造精神是不可磨灭的。

编辑说明

一 本丛书为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由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编辑出版。主编黄侯兴。

二 本丛书包括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共六集。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创造社同人的理论主张、思想倾向与发展变化及其作品的风格特色。

三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编选原则，本丛书侧重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有代表性的文论与作品。除创造社成员外，兼收一些思想、艺术倾向于创造社的作家的文章，力求通过广泛的选录，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创造社活动的全貌。

四 选录的文章，基本上按照创造社活动的历史阶段为序，作者与文章按发表先后排列。尽量从最初发表的报刊或书籍中录用，少数转引自别处或作者对内容有所增删的，文末加以说明。编选者对原文不作任何增删，以保存历史资料的原貌。

五 本丛书分别由黄侯兴编选文艺理论集、诗集，蔡震编选小说一集、二集，杨均照编选散文集，周亚琴编选戏剧集。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李一氓、夏衍、李初梨、阳翰笙、林林等同志的亲切指导与热情关怀。阳翰笙同志为本丛书作序。林甘泉、马良春、雷仲平、郭平英、李维国、田靖、郑延顺、黄铭华、诸天寅等同志，也曾给予许多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在编选上仍会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六 本丛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

一九九〇年三月

目 录

创造精神赞——代序	林 林 (1)
论创造社作家的文化心态	黄侯兴 (1)
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	
——纪念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	王富仁 (21)
创造社的精神历程	冯 奇 (48)
创造激情的文化思考	蔡 震 (64)
严肃而痛苦的青春祷告	
——前期创造社与五四青春人格创造	周海波 (81)
创造社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	朱寿桐 (98)
创造社给予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冲击	
..... (台湾) 周 锦	(114)
创造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朱成甲 (123)
简论前期创造社文学建设的现代	
意义	龙泉明 白春超 (141)
前期创造社创作的原型与象征	胡志毅 (152)
论前期创造社的“创生”意识	李继凯 (163)
论创造社前期的文艺批评理论及其	
实践	谷辅林 唐宜荣 刘洪勋 (176)
论前期创造社对反对封建道德虚伪	
性的贡献	宋益乔 (187)

感伤：创造社浪漫主义的形态、民

族特点及其他	陈永志 (201)
创造社前期小说的创作特征	刘家鸣 (212)
论前期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	李玉明 (227)
浪漫主义对“五四”戏剧的审美影响	刘珏 (243)
创造社与西方现代主义	黄川 (257)
创造社的“著作权意识”	吉少甫 (268)
创造社分期刍议	黄淳浩 (279)
论《文化批判》 ——兼及后期创造社的“方向转换”	周惠忠 (292)
关于创造社评价问题的思考	傅正乾 (311)
十年思索的再思索 ——评八十年代的创造社研究	魏建 (320)
创造社研究资料索引	王佳 卢炜 丰晓立 整理 (337)
创造社研究的深入拓展 ——创造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晨雨 (349)
编后记	(357)

论创造社作家的文化心态

黄 侯 兴

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亘古未有的急剧动荡和深刻变化，一个古老僵化的封建帝国正在解体。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①，这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志士仁人所苦苦探索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加速殖民地化和封建势力的仍然顽固强大，使人们预感到这个民族将遭到炼狱的煎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飞速发展，破除了昔日“中国中心论”的迷信。新的科学文化的输入，特别是其后社会主义思潮的输入，使处在历史更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中逐步获得新的视角，产生了变革现实的强烈要求和新的希望。怀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社会理想而东渡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结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团，开始了挽救祖国、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的光辉的战斗历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这批青年人意识到“这是新时代的觉醒”，要拯救中国，只有“从整个的封建传统蜕化出来”，“脱胎换骨地独立自主地开始创造”^②。他们不愿意等待，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参与国内变革现实的斗争。他们要彻底毁坏现存的社会秩序，打破中国沉闷的现状，唤起国人的爱国热情，建立起创造的信念。于是，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发起成立文学团体创造社，创办文学刊物，开展文学的文化的活动。他们以独异的文化观念，彻底的叛逆精神，创新的锐气和觉醒后的理想追求，以及为实现“人的

解放”所表现的强烈的主观能动性，震动了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创造社在“五四”思想革命中，把人的解放、自我的解放当作反封建的第一要务。“人”被摆在一个非常醒目、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对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创造社作家以浓重的感情色彩去张扬人的解放、自我的解放，以此确认自己的文化选择，建立新的价值标准。他们代表了一代新的知识分子觉醒的心态，要求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真正价值，寻求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以喧嚣自我跻身文坛，呼唤人的觉醒。郁达夫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③中国人丧失“自我”，以奴隶的身份苟活着已经几千年，到“五四”才醒悟到要找回自我，寻求着具有主体意识与情感的自我的回归，确认独立的自我存在的价值。

如果说，《新青年》同人和文学研究会作家，在鼓吹“人的解放”、“自我的解放”时，作了许多具有历史化、群体化特点的工作，创造社作家在参加“五四”争取个性解放的民主斗争中，则把人的解放、自我的解放作了富有个性色彩的扩张与夸大，显示了独特的文化心态。创造社所张扬的自我，不只是意味着摆脱了奴隶地位的“个体的人”，而且给这“个体的人”注入了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赋予了它鲜明的主宰性、排他性和超越性。

“五四”时期，创造社作家主要接受西方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接受尼采“超人”、“自力”哲学的影响，突出强调自我的独立不倚、超凡脱俗、驰骋宇宙的意志和行为，强调“一切都要自力，不可依赖他人”^④。他们追求的这种自我，摆脱了对外界自然环境与社会势力的各种依赖关系，不再受万物的支配与摆弄，自称是宇宙

的主人与至尊。如郭沫若所津津乐道的，自我不再是“自然的孙子”、“自然的儿子”，而要做“自然的老子”^⑤。也就是说，不是大自然支配和奴役着人，而是人支配和改造大自然；自我在物理宇宙中占据主动的、主宰的地位。郁达夫援引马克斯·史特纳的话说，“自我是一切，一切是自我”；“我是唯一的，我之外什么也没有”^⑥。

创造社作家依据这个信念，把自我的生活圈子拓宽为世界中心，人不再作为一个被禁闭在有限的物理宇宙的狭隘围墙内的囚徒那样生活在世界上了，它具有不可穷尽的丰富性，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特点。郭沫若的《天狗》一诗，就最能表达这种狂放的心态。诗人呼喊：“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诗人把自我化为“全宇宙底 Energy（能——引者）底总量”。这里的“天狗”，是自我无限扩张的象征，是通过广袤的宇宙来衡量自己的力量，从而意识到人自身的无限性的象征。

张扬自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完成“人的自觉”和解放。创造社作家意识到，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是实现“人的自觉”和解放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竭力用“我”来否定超人和超自然的主宰者——神、上帝的存在。郭沫若用泛神的观念提出“泛神便是无神”的主张。“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现，我也只是神底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⑦。“我”凌驾于神、上帝之上，在“我”面前，没有任何偶像存在。为了实现“人的自觉”，保持自我人格、意志的自主自律而“不受催眠的暗示”，郁达夫提出了四个“不可”：“不可盲从，不可崇拜偶像，不可服从多数，不可人云亦云。”^⑧这些都是他们为了确立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所强调的理论观点，也是“五四”争取个性解放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甘心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束缚的革命精神。

这种张扬自我的革命心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在发生变化，不断地在更新。在中国工农运动的有力推动下，创造社

作家所张扬的自我，在内涵上有了更广泛的开拓，逐渐地“把自身的小己推广成人类的大我”^⑧。他们在作品中共同塑造出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的抒情形象。如郭沫若笔下“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大我”，在太平洋这个圆形舞蹈场中“戏弄波涛”的“大我”，占据宇宙的中心，具有伟大的气魄，无穷的力量。它是力的象征，力的符号。它如无限的太平洋可以“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周扬肯定了这种为完成“人的自觉”而显出“暴躁凌厉之气”的喊叫，说“他的自我以特别突出的姿态在他的诗句中喧嚣着。从它，发出音调，生出色彩，涌出新鲜的形象”^⑨。又如何畏笔下的“大我”——“巨人”：“一脚踏住了惊层巅，睁目向红尘凝瞰，半怒半怜；一拳掀住了钢琴瓣——恨不得一纵——听！山谷鸣动……（《Beethoven 赞》）。郁达夫把这种“大我”解释为“一个足以代表全世界的多数民众的大我”；“大我”已经“把一时一刻的个人感情扩大了，变成了一时代或一阶级的汇聚感情”^⑩。

创造社张扬自我还受着体现近代文化进步的“类似意识”的牵引，把“大我”同为争取美好的社会理想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赋予它清新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化中华民族”^⑪未来的理想。郑伯奇认为，“五四”以后的新人，热心于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劳工神圣，都是类似意识的扩张；类似意识是要实现小我的解放，确认“在二十世纪的我们都有作世界人的义务和权利”^⑫。创造社作家对于“自我”人格力量和创造力量的充分自信，以及对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烈追求，都是为着建造一个虽然朦胧却殷切向往的理想世界。

创造社是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文学团体。主观性和冲动性，构成了这个团体的多数作家的浪漫的文学心态。所谓主观性，即他们在反映社会生活时始终不忘记要“表现自我”，而且强烈地要“张扬自我”，借文学——诗歌这支芦笛来“以鸣我的存在”^⑬。他们注重主观感情、情绪的自然流露。郭沫若在诗歌中追求的是自我“命泉中流

出来的旋律”，“心琴上弹出来的曲调”，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③。郁达夫、陶晶孙、王以仁、白采等人的小说，也是把自己的苦痛、愤懑，通过直抒胸臆喷发出来，或激越呼叫，或感伤哀鸣，或缠绵低吟。他们驱使主观情绪时，常常趋于偏至。有时兴奋癫狂，心雄万夫；有时自怨自艾，惆怅徘徊。所谓冲动性，即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一任自我突发式的感情自由驰骋。如郭沫若所说，“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④。倪貽德也说，他“这几年的生活，是纯以感情的冲动来作中心”^⑤。他们凭着这股强化了的感情冲动去张扬自我，把自我的觉醒、自我的意志和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

冯乃超对浪漫主义作家这种主观、冲动的文学心态作过精采的分析，说这种心态是“对自己所处的没有理想、失去光明的社会环境竖起反叛的旗帜，对民族的衰老状态给以激情的诅咒”；它是“一颗炸弹，抒发了自由个性的感情，唾骂旧世界的没落性，对于社会的昏迷状态，来个‘振聋发聩’的雷霆”。这些浪漫主义作家虽然也如乔治·桑一样认为艺术是“理想的真理底追求”，但这种追求并没有脱离生活的轨道。“民族苦难的现实，始终要我们的作家双脚站在大地上”。他们“有媲美拜伦投身希腊独立战争的热情，也有象兰坡充当‘革命枪手’的勇气”^⑥。

创造社这些作家固然缺乏鲁迅那种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邃的认识能力，缺乏鲁迅那种韧性的战斗气质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他们思想敏锐，感情热烈，想象力丰富，富有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他们飞扬凌厉，粗犷豪放，对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具有一种纵然有些空漠、却是无比强烈与诚挚的信念。他们一出现在文坛上，便张开浪漫主义的翅膀，象新生的凤凰一样自由翱翔，搏击着“五四”的暴风雨前进。他们依据这种心态在作品中写出自己内心体验的真实，给读者提供了一幅心灵的图画，一幅维系着“我”与祖国

的情感交流的图画。

创造社许多作家是资质聪明的年轻人，是属于有才气、有灵气、有朝气的新一代的大学生。他们从张扬自我引发出对“天才”的崇拜。他们自认是天才，也常常认他所喜欢的团体内的同人是天才，因之把自己和某些同人看得过于尊贵。他们昂首天外，自视甚高，带有古时的名士风度，也沾染了西方浪漫派、颓废派诗人放浪不羁的习气。如郭沫若和田汉游览日本大宰府时，在庙门前合影，郭骑着铜牛，田抚着麒麟，自比歌德与席勒。“我的诗，你的诗，便是我们的铜像，便是宇宙底写真师！不用他求，只表自己！”^③。又如一九二二年初秋的一个夜晚，郭沫若和郁达夫在上海，一连在三家酒店喝酒，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在回民厚南里路经静安寺路时，他们踉踉跄跄地咒骂西洋人、资本家，郁达夫突然跑到街心，对着迎面驰来的汽车，举手叫嚷：“我要用手枪对待！”^④这些都反映了“新才子派”（鲁迅语）反抗旧社会时的狂热、浪漫的心态。

创造社作家自恃天才，对于群众和其他一些文人作家则往往采取傲然的态度。如郁达夫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而“世人的才智，大约都在水平线以下，或与水平线齐头的”，因此对于天才的作品，“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究是不能理解的”^⑤。有人甚至认为，“群众是不能改造的，是永远不能改造的”；“我们不要做 Popular 的人，我们要永远做少数的人，我们不要怕我们是被群众抛弃的人，因为我们是早抛弃了群众的人。我们，这少数的我们，那倒不可不携手在黑暗中摸索！”^⑥在文坛上，他们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为无能、“俗气”，而把自己从唯美的艺术观念去表现“内心的要求”的创作，看作是“天才的作品”。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一文中，按自己的美学原则几乎把“五四”的诗坛全否定了。他嘲笑胡适的《尝试集》是“猜谜歌”、“恶作剧”，康伯情的《草儿》是“演说词”、“点名录”，周作人的《雪朝》“拙劣极了”等等。他指责这些草创期的新诗是“浅薄无聊的文字”，“鄙陋